

舒立对话2

未来十年， 中国会更好吗

胡舒立 王烁 主编

财新图书
Caijin book
series



“圈钱”怎样成了中国特色？

政府如何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加深的官民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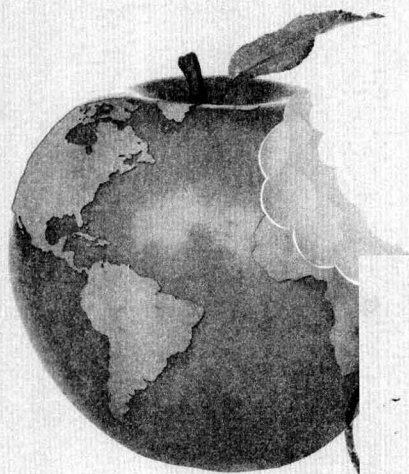
中国怎样实现计划命令经济向法制市场化经济的转变？

舒立对话2

未来十年， 中国会更好吗

胡舒立 王烁 主编

财新图书
Caijin book
seri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舒立对话 2 / 胡舒立, 王烁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财新图书)

ISBN 978-7-5399-4411-1

I. ①舒… II. ①胡…②王…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0369号

上架建议: 财经·时政

舒立对话 2

主 编: 胡舒立 王 烁

责任编辑: 刘 霁

监 制: 伍 志

特约编辑: 于向勇

封面设计: 王 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40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4411-1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推荐序一

三年前一天，胡舒立和李昕走进华盛顿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的办公室。几天后，他们与保尔森的对话，以《保尔森信号》为题，刊于《财经》杂志。对话关注当时即将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本书37篇对话的核心关切一样，也和舒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如一的职业兴趣一样，与保尔森对话的焦点，是中国的改革。

特别提到此篇，是因为注意到舒立团队采访保尔森的日子——2007年3月14日。就在这一天（北京时间3月15日），中国内地各主要网站刊出消息《美次级贷款地雷引爆 金融危机四伏》。舒立无疑是步入了正在形成的风暴的中心。她应该已经注意到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盈利预警，和汇丰控股为在美次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准备的新闻。但是那一天，无论她还是保尔森，显然都还没有意识到祸之将至。“保尔森信号”，不是关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海啸已经逼近的警讯，而是对中国加快开放资本市场的鼓励。

五个月后危机全面爆发。舒立任主编的《财经》杂志刊出了《金融风暴 全球共振》一文。倏忽三年。三年后的2010年4月5日，舒立在北京再次访问保尔森。依然是从前的团队，但他们的媒体已是《新世纪》周刊。在题为《保尔森答案》的新的一篇对话里，有段耐人寻味的交谈：

保尔森：……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跟我说，“Hank，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新世纪》：中国没老师了。

许多年后，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2007/2008这个时间刻度上，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正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刻遭遇逆风和恶浪。在《保尔森答案》一文中舒立和她的同事评述：

许多致力于改革的人士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中国在经济上受创有限，但改革开放之路受挫，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部以经济自由化为主，外部以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体系为主。在金融危机之后，两者都有所失速。国家干预主义不仅大占上风，还隐有固化可能。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声音在金融动荡之下失声。中国30年来固然走所谓自己的道路，但自己的道路是不变量，变量基本来自“以美为师”。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老师有麻烦了”，有麻烦的还有学生。

这正是舒立最深的忧虑——“许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幸亏没改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说不定更像欧美，更容易出问题。金融危机好像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且简直变成了不必要改革的一个根据”。就在2010年再访保尔森的4天前，舒立团队与经济学家吴敬琏、汪丁丁、高尚全座谈。《推进整体改革议程》一文，第一句话便是“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在这篇对话中，舒立团队和三位学者更深入地探讨了当今中国的困局和出路，他们的对话掷地有声。

高尚全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近年来，中央政府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上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展并不平衡，主要有四大不协调：首先，改革滞后于开放；其次，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不协调，累积了诸多深层矛盾。”

吴敬琏说：“2000年至今，十年过去了，中国前途的两种趋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跟‘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赛跑。目前，赛跑的态势怎样呢？应该说，两方面都有所斩获，现在还胜负难分。”

汪丁丁说：“对抗或抑制官僚资本主义倾向的更具体的步骤，我认为最值得优先尝试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民主化实验。预算民主和预算透明很重要，这其实是抑制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可行的办法。……记住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我常常警告周围的朋友们，是税收和预算的专断权力。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冲突转化为政治危机，它很可能是导火索。”

这是本书中提纲挈领的文字。座谈结束时，舒立说：“其实，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括言之，无非12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不但攸关13.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有直接影响。”

“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舒立的发问，道出无数有识者心头的关切。这正是本书的主旨。《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这个书名，看似举重若轻，却无法让人轻松。我是舒立的同行。书中诸篇对话，把我的视线引向世界和中国的变局，也引向舒立团队本身。未来十年，中国传媒何去何从？作为中国传媒的领跑者，这个团队的理念、品质和未来路向，值得同行瞩目。

中国新闻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子系统。新闻改革同样有内外两种动力。内在的动力，源自传媒人对前苏联“真理报模式”的扬弃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外在的动力，源自传媒市场化。告别“真理报模式”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传媒市场化与经济体制改革有莫大关系。

观察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的传媒演变历程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认为中国传媒大致有四种路向：

第一块路标上写着“权力”。这是改革开放前的“真理报模式”：严密管制，以计划经济方式运行。这过去的历史似已遥远，然而若改革发生严重逆转，新闻改革的内外动力丧失殆尽，媒体仍有可能倒退回30多年前。这可能性虽微

乎其微，但仍应存有警觉——极“左”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块路标上写着“金钱”。这是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的事实：威权管制崩塌，媒体的洪水冲决闸门，利润最大化成为传媒的最高追求，媒体进入恶质化的痛苦期。海峡彼岸的朋友曾告诉我们这种“自由到来后的苦闷”，但饱受钳制之苦的我们对这种前景注意不多，却对凭借市场化力量突破控制怀有浪漫的希冀。

第三块路标上写着“权力+金钱”。这是今天的现实：畸形的传媒市场化。在政治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现实环境下，一些媒体正将“一要听话，二要赚钱”作为信条。“真理报”那一套改变无几，但却被大大注入了商业元素。一些媒体被赋予做强做大的特殊地位，依附权力，又试图垄断市场。这样的“市场化”，没有自由平等的竞争，却处处可见计划体制的遗弊。此种官商官媒，正为权贵资本主义所需。

第四块路标上写着“公器”。这条道路上的媒体，有志独立于权力与资本之间，把“自由”和“责任”视为一对相伴相生的永恒命题；坚守新闻理想，又能驾驭市场风浪，在传媒市场竞争中自立自强。

我认为舒立团队奋力探索的是第四条路，一条在传媒市场中谋生存、求发展、争自由、做公器的道路。这是一支专业性很强的财经类媒体制作团队，他们尊重专业知识，有冷峻严苛的操作流程，但却不囿于狭义的“财经”。他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高度关注公共政策，难能可贵地“既不惟权力的马首是瞻，也不惟资本的马首是瞻”。或者说，在舒立眼中，原本就没有那种可以自外于社会与政治的所谓“市场”和“财经”。她有一段谈论资本市场的名言，道出她的理念：“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而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就是公开性的保证。”

今天中国传媒的种种坎坷，就是高尚全先生所说政改滞后于经改所累积的深层矛盾的反映。中国传媒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但只有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好的市场经济”，才能给中国传媒带来希望。而推动民主法治，呼唤

“好的市场经济”，正是传媒的迫切使命。

传媒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投身市场竞争。今天的中国传媒，是政治角色，是经济角色，然而更应该是社会角色。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它承担着维护公共空间的使命。媒体是企业，但优质的媒体一定是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社会企业。它的专业性，首先表现为它的公共性。它监督权力的运行，但自身亦要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定义传媒属性，让媒体成为独任其责的社会角色的新闻改革，无疑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翼，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翼。

未来十年，是攸关中国前途、也攸关中国传媒命运的关键十年。改革之路会不会受挫？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间的赛跑谁胜谁负？是否会发生经济冲突？经济冲突是否会引发政治危机？舒立团队正密切关注。2010年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40天中七谈政治体制改革。舒立第一时间在个人博客上发表评论：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出现了一种论调：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按此逻辑，中国60多年来几无变化的政治体制，先验地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基于这种“中国模式”之“政治优势”，过去不必改革，今后也无需改革。这种论调无视当前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现实，与中共已有的政改决策相抵牾，也是对昭昭民意的漠视。

这是舒立的敏锐，也代表着团队的品质。未来十年的大幕已经开启，新的大戏充满悬念。危机，冲突，奋进，挫折，衰亡，新生……波澜起伏的新故事将一幕幕拉开。舒立团队，请当仁不让，和新一代改革者一起，担当起推动中国进步的历史重任！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钱 钢

推荐序二

转型期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与金融活动，无不受到转型的影响。收录在这里的舒立对话，自1998年至2010年（主体为2007—2010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前期“放权让利”改革结束后经历的最错综复杂时期。

中国社会这一次转型，是“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以经济的转型期最短，大约需要30~50年。各国人口生育率迁移（demographical transition）的数据表明，在两代人时间内，一个“人口经济”过程通常完成这一迁移，进入人口的老龄化阶段。经济转型的起始年份，按照通常的看法，是1978年。不过，主导经济的思想转变，应是1956年，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所以，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大约在2028年以前结束。

政治转型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过程，它首先依赖于本土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传统的转型，这就需要远比两代人更久的时间。例如，以1900年“欧风美雨”自西洋和东洋呼啸而来为开端，政治的转型已持续了百年之久，此即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过程令人困惑的原因或内在紧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我们数千年以来固有的情感方式与我们试图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大国尤其如此。

制度（家庭的、教育的、医疗的、生产组织的和国家的等），马歇尔

曾指出，毕竟要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故不能迅速改变。然而，中国社会这一次经历的转型却是迅速的，与各国转型相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不迅速。在这里，我们熟悉的一切事物，在十年之内发生的改变，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叹，更足以让每一个外国人或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感叹。

如此大范围的社会变迁，在如此短促的时期内发生着，激发了生活在稳态社会里的观察者难以想象的事件的丰富性和冲突的尖锐性。舒立，在我试图概括她的特殊禀赋之前，我必须指出，她首先和我们每个人一样，“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时代”。

人类社会经历过许多特殊的时代。纵观思想史，在西方和中国，要指出这些特殊的时代并不困难。例如，王国维指出过，商周更迭，为亘古以来最大一变。这之后的秦至前汉、魏晋至唐初、宋末和清末民初，均可称为特殊的时代。

鲁迅自述，家道中落的人，最有机会洞察世事。类似地，特殊的时代，社会的起伏动荡远比平常剧烈，从而产生无数人家的兴衰更替，这就为思想者提供了难得的体验。思想的深刻程度，与事件的丰富性和冲突的尖锐性恰成正比。

有机会体验，并不意味着能够激发深刻的思想。前者是客观的，后者依赖于主观因素。思想的深刻性，更主要地取决于心灵的敏锐程度。另一方面，在同一社会环境内，一个人的体验孰多孰寡，更主要地取决于性情。性情，心理学的术语是“personalities”，直译是“人格”。我们人类的情感，延续时间最短的，称为“情绪”（emotion）；稍长些的，称为“心情”（mood）；更长些时间的，称为“性情”（temper），或更学术地称为“气质”（temperament）；最后，我们性情当中能够维持毕生而不变的部分，心理学家称之为“人格”（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受试者人格量表的得分在23岁至83岁之间无显著改变）。

舒立的性情——熟悉她的朋友们都知道，是性情中人。这是一种人格魅力。哪怕出自相似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与没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相比，可以有更多的体验机会。古希腊人相信，人格即命运。在舒立那

里，这一信条可再度接受检验。

我和王烁（我替王烁作此猜测）属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初识即被舒立的人格魅力吸引的人。我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我因文笔较佳而常被报刊主编们询问可否撰稿。某年某日，我赴三联书店董秀玉的宴请，席间一位主编再询撰稿事宜并再遭婉拒之后，终于启齿问了一个平常很难提出的问题：请问舒立给你多少报酬？众友静默，等待我回答。知道了我所得的报酬，那位主编大笑不已。我明白，我难以用报酬这样的理由推辞撰稿邀请。董秀玉迅速替我解围，她的解释：丁丁和舒立，当然友情更重要。十年过去，我仍记得此事，因为董秀玉的解释，显然最中肯。

舒立的财新团队几乎是一个关于中国新闻的传奇故事。我在舒立的编辑部也多次试图概括这一传奇的思想史涵义。我记得，比较令人信服的一种概括，我们称为“小圈子”的广泛“影响力”。例如，以马赫为思想领袖的维也纳小组是战前欧洲一个影响深远的小圈子，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波普和哈耶克，以及许多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都受了它的影响，然后，这些影响通过这些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例如，洪谦老先生是石里克主持的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文明世界更广泛的影响。又例如，在数学界有一个影响广泛的小圈子——“布尔巴基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和学术研究改写了现代西方的全部数学。最后一个例子是当代中国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在收集了足够多的素材之后，在一次学术会议发言时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活跃人物几乎都源自陕西和山西的两个“知青点”。

无论如何，最终让我的“小圈子假说”获得充分说服力的，是MIT一位统计物理学教授发现的“幂律”。根据这一规律，我们体验到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全部事件，如果按照事件的重要性排序的话，统计而言可出现这样一种规律：在经历了许多，例如几千项平凡的事件之后，总会有例如一项不那么平凡的事件发生。让我们将平凡事件的集合记做集合1，后来发生的不那么平凡的事件的集合记做集合2，在经历了许多集合2的事件之后，总会发生一些

比“不那么平凡”更重要的事件，这样的事件的集合记做集合3，诸如此类，我们于是可以有一系列集合，记做集合1、集合2、集合3……幂律的意思是：任何一类事件，足够多的集合1的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要有一件集合2的事件发生，足够多的集合2的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要有一件集合3的事件发生……以此类推。如果在平面上画出重要性的级别及其事件数目的关系，那么，重要性的级别和各级重要性事件数目的对数，二者之间呈现一条负斜率的直线。根据幂律，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我们培养了10万名北大毕业生的时候，意味着大约有1000名可称为“出类拔萃”之辈的毕业生，在他们当中大约有10名可称为“天才”的人物……依此类推，若要涌现出1名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人物，我们或许需要培养100万名北大毕业生。

在社会思想的领域，小圈子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那些最重要的观念，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强烈互补性。于是，我们必须寻找尽可能多的携带着较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的人，非如此，不能获得更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

不难想象，这些携带着级别较高的重要性的观念的人，可能多么地难以相处。文人相轻的倾向，在中国始终很严重。舒立的性情，在职业优势之外，使她能够恰到好处地与这些携带着较高重要性的观念的人相处。

职业优势，是的，舒立在新闻界享有优势。例如，那一著名评语——“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从海外新闻人的角度刻画了舒立的这一优势。从局内人的角度，多年前我为她的另一本文集作序时写过，舒立的优势源于她心智的特征。她具备一名优秀新闻记者的心智特征——在任何突发事件中迅速捕捉最重要的信息。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与上述关于重要性的观念有关，不过，你还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理解力，否则，即使你接触到这些具有较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你仍无法理解它们。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如上述，携带着具有重要性的观念的人总是试图接触与他们同类的人。但芸芸众生，他们到何处寻找他们的同类呢？媒体，只有媒体最可承担这样的功能。你可以试着通过一份影响广泛的媒体发布和阐释你的那些具有较高级别重要性的观念，并预期由此引来同类重要性的观念携带者的注意。舒立兼有二者。她是携带着较高级别重要性的

人，同时还是最具影响的媒体人。我再重复一遍，这要求一颗强有力的心。

收录在《舒立对话》中的文章，我认为，难度最大且内涵最丰富的采访，同时也代表了这本文集的最高水平的，是“中信再出发”。我甚至建议读者直接去读那一篇，以便熟悉和适应舒立的风格。其次，从学术角度，我认为提出了最多的既是实践问题也是学术问题的最具挑战性的采访，是“工行应变”。对话的水平取决于对话双方所思的深切与广泛。舒立在这两篇采访中的对话者，前一篇是孔丹和常振明，后一篇是姜建清。作为经济学家和主持金融学教育的学者，我对这几位对话者的印象，如上所述，因读了舒立的这两篇采访报告，十分深刻。

一颗强有力的心——情感的和智力的，如舒立这样的，随着更多和更深切的体验而不断进步。这样的预期，是可以确认的——从这本文集各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和它们的品质。

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汪丁丁

第一辑 宏观政策的进退之策

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政府职能 /002

——与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

宏观政策的进退两难 /013

——专访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

重庆“新经济政策” /022

——专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十二五”规划改革重点 /046

——专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

谈金融改革原动力 /052

——专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

如何完善国有金融企业的绩效评价 /060

——专访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真的” /063

——专访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

第二辑 社会公正与财富再分配

反腐新规则 /074

——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

依法治国的前景和方向 /083

——与法学家马怀德、张恒山、江平、陈光中四人谈

农村土地改革的新思路 /090

——专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未来医改的五项重点措施 /100

——专访卫生部部长陈竺

诊治中国“灰色收入” /104

——与学者赵人伟、王小鲁、郑也夫、刘彬四人谈

第三辑 圈钱不应当是中国特色

庄家吕梁之一 /112

——披露中科创业股价跳水内幕

庄家吕梁之二 /118

——披露中科创业股价跳水内幕

庄家吕梁之三 /126

——披露中科创业股价跳水内幕

反洗钱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133

——专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项俊波

如何完善证券监管体系 /138

——专访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陈舜

第四辑 国企艰难变革

避免最坏的结果 /152

——专访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熊志军

冷静看待钢铁业重组 /157

——专访江苏沙钢创办人沈文荣

河北钢铁是如何炼成的 /160

——专访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义芳

新东航下一步 /167

——专访东方航空集团总经理东航股份董事长刘绍勇

海外资源收购的中间道路 /174

——专访中海油集团总经理傅成玉

中化要往上游去 /186

——专访中化集团党组成员、副总裁韩根生

中信再出发 /191

——专访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

第五辑 银行改革之路

国有银行改革中期报告之一 /208

——专访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

国有银行改革中期报告之二 /216

——专访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

国有银行改革中期报告之三 /227

——专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

国有银行改革中期报告之四 /237

——专访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

中行进与退 /244

——专访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

工行应变 /252

——专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

项俊波谈农行 /261

——专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项俊波

详解进出口银行之路 /270

——专访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第六辑 激荡中的民营资本

王志东沉没上篇：去职风波 /278

——专访前新浪 CEO 王志东

王志东沉没下篇：英雄沉浮 /285

——专访前新浪 CEO 王志东

投资如相玉 /294

——专访联想控股弘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

能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吗 /298

——专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收购悍马有各种预案 /301

——专访腾中重工 CEO 杨毅

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 /304

——专访搜狐 CEO 张朝阳

国美不姓“黄” /309

——专访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